

(1-5)

合订本

藏书家

珍藏版

齊魯書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藏书家:珍藏版/齐鲁书社编. — 济南:齐鲁书社,
2005.9

ISBN 7 - 5333 - 1509 - X

I . 藏... II . 齐... III . 藏书-文集
IV . G253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82942 号

藏书家(珍藏版)

本社编

齐鲁书社出版发行

(地址: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250001)

E - mail:qlss@sdpress.com.cn

山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 × 1168 毫米 32 开本 54.75 印张 3 插页 1325 千字

2005 年 9 月第 1 版 200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33-1509-X/Z·131

(全二册) 定价:98.00 元

網羅放失
傳之其人

藏書家創刊之喜

九五老人顧廷龍題



齊魯書社
藏書家
創刊志喜
留薪傳
子蘇
窮

王紹曾敬書

時年八十有八



二所造

少安反为

藏七家题

八五
一
一
一



百宋子元又一時
卿環清夢亦遊思
今朝嘉話更蒐拾
共續藏書紀事詩

齊魯書社刊行藏書家
黃永年賦贊



讀金匱石室書
做琪花瑤草人

朱新夏題



藏书家

第1辑

藏书家

齐鲁书社

藏書家

九四夏頌廷龍題



目 录

发刊题辞	顾廷龙 王绍曾 程千帆 黄永年 来新夏
藏书忆往	
1	吴小如 三代沧桑话藏书
5	涂宗涛 苹楼藏书谈片
11	姜德明 野草忆往
15	汪家明 我的“善本”书
书林一叶	
19	黄 裳 来燕榭书跋
23	倪墨炎 藏书家题跋的风格
书海披沙	
30	宁宗一 淘书况味
37	止 水 姑苏书缘
雪泥鸿爪	
43	来新夏 池北书库与王士禛
47	徐 雁 藏书楼影话
59	曹培根 江南明珠脉望馆
版本谈故	
63	张景枬 宋刊通鉴总类
65	林 夕 明寒山赵氏小宛堂刻

		《玉台新咏》真伪考实
73	孟宪钧	《读书敏求记》版本小记
83	贾二强	清顺治朝的御制御注书 与内府刻本
89	范景中	清代活字套印本书录
98	周振鹤	《简报》与《官话日报》 ——清末济南出版的两份报纸
109	田 涛	中国最早的科技杂志 ——从“中西闻见录”到“格致汇编”
119	李国庆	漫谈古书的刻工
著书新语		
127	王绍曾	从海源阁书目整理谈到 海源阁藏书聚散
访书纪闻		
138	黄永年	半世纪前南京买书小记
144	杜泽逊	台北访书记
153	陈子善	东京淘书琐记
学人书事		
158	徐有富	程千帆与《校雠广义》
藏书架		
164	宋平生	《清代版本图录》读后
166		编后记

三代沧桑话藏书

吴小如

吾家之有藏书，自先父始。先父玉如公十九岁丁父忧，学业中辍，远游东北。后定居哈尔滨，长期在中东铁路局（原名中东铁路公司）工作。“九·一八”之后，于1932年回到北平，先后在东北十余年。家中大量图书，都是先父在哈尔滨购置的。记忆所及，以扫叶山房石印本古籍为多。因先父上有老母，下有妻孥，买书备用，无力搜求善本。但书橱中仍见有一二部元、明刻本，大约也是廉价买到的。1935年先父到母校南开大学任教，经济条件稍裕，这才开始购买大部头丛书，如《四部丛刊》初编、百衲本《二十四史》、《说文解字诂林》正续等巨帙。由于先父酷嗜书法，收藏的碑帖较多，约占全部藏书的八分之一。

我因父亲藏书不少，自己很少买书。甚至自己当了教书匠，买了书也放在父亲的书橱中，并无“私有观念”。因父亲已藏有《四部丛刊》初编，我个人所买的书籍，乃多为《四部丛刊》续编、三编的零种和《四部备要》里所收的常用古籍而为《丛刊》初编所无者。更因限于财力，多买平装排印本以及坊间翻印的古籍。后来我结了婚独立门户，才正式有了个人藏书和部分碑帖。

舍弟同宾久居津门,他是专治戏曲的,除原有一部分新文学作品外,后来添置的大都是戏曲方面的专业书,以及少量的有关文艺理论书籍;加上一些古籍和工具书,所藏亦自可观。及十年浩劫,在天津旧居的藏书,不论是属于先父的、舍弟的还是我留在津中的,均被抄没一空。后来虽发还了一些,亦属残编断简。至于我自1951年定居北京西郊后陆续买到的书,“文革”中亦损失殊巨,惟尚不及津门旧居“扫地出门”那样惨重。

由于受父亲影响,我买书亦只是为了阅读备用,故所购亦无善本。平生只买过三部明版书(其中一部《山谷刀笔》是元刻本,书商定为明初翻印者),1975年妻子动大手术,她又没有公费医疗,只好全部廉价卖掉。父亲在“文革”中生活无着,便把《四部丛刊》初编卖掉,我因住屋狭小,再也不曾添购。百衲本《二十四史》,先父作为结婚妆奁赠送给他外甥女了。我在1957年因中国书店允许我分期付款,乃另买了一部老同文版《二十四史》,至今还在使用。我自置之书还有一大部分是新文学作品,如周作人的全部散文集,以及朱自清、俞平伯、废名、沈从文几位老师的单行文集,“文革”中都被弄得残缺不全。我便把一部分书送给治新文学的朋友,极少数的几本旧版书如开明书店版的《桥》(废名著)、现代书局版的《猫城记》(老舍著)等则给了爱好现代文学的小女儿。目前寒斋所存,只剩下一堆古色古香的“国学”书籍了。

“文革”期间,我和王瑶(昭琛)先生的藏书都被抄走了很多。事后“交流”情况,发现我和昭琛先生的藏书中,凡有关《庄子》的注本都不见了,想必北大中文系从事抄家活动的“红卫兵”学生中有专门研究老庄哲学的人材。至于我的大量工具书,包

括古代类书和晚出的《中华大字典》、《辞通》之类，则一本未动。后来一位在中央党校工作的老同志（现已离休）对我开玩笑说：“你的藏书中最有用的就是这些大部头的工具书，要是我去‘执行任务’，我就专拣这一类的书据为己有。”

劫后检点旧藏，发现有两部值得一提的书。一部是线装清刻本的《四书翊注》，虽非善本却属孤本。此书清代理学家刁包（字蒙古）所著，虽阐发朱注而其中却不乏精义。我曾检程树德《论语集释》后面所附的引用书目，并亲自问过撰写《论语译注》的杨伯峻先生，他们都未见过这部《四书翊注》。程、杨两家所引刁氏之说，均转引自它书（如《论语集释》便明言引自《经正录》，伯峻先生则亲口对我说过是从清人著述中转引）；而北大、清华及原燕京大学三校图书馆于此书亦均未入藏。另一部为平装排印本，是由厦门大学印行，乃林庚（静希）先生早年所著的《中国文学史》，书前扉页上还有静希师亲自题写的两行诗句。这书是1946年初识静希师时承他惠赠的。书中把我国文学史分成“黄金”、“白银”几个时期，亦属别开生面。静希师晚年把旧著改写，书名《中国文学简史》，由北大出版社出版并已重印，但原版旧著还是极有纪念意义的。

自1982年先父病逝，我和舍弟又陆续购置不少新版图书。舍弟所藏仍偏重于戏曲专著，我则近于“拾遗补阙”，多买前所未藏和藏而已失的各类古籍，依旧为了阅读备用，不大讲求版本。其中有两事不妨一说。一是门人傅璇琮君主编的一套《唐才子传》，全书四册，独其中第二册付诸阙如。我偶在一篇小文中提及，竟承丹东一位不相识的朋友远道惠寄，使我把一套书凑齐。我深感高谊，聊以自己主编的一本工具书寄赠，然实不足报其情

谊于万一。另一是中华书局出版的点校本《续资治通鉴长编》。此书是陆续出版的，始由出版社慨然惠赠数册，后来却不再送，只能出一本买一本。中间有好几年竟停止印行。这时我发现此书在校勘上颇成问题，不便使用（我曾在一篇拙文中对它进行批评），后来便未再续买。加上寒斋窄陋，几本破书已充塞得“顶天立地”，其书今虽已出齐，我亦不拟再买，因买了也无地存放。几时得有暇晷，颇想把已有的若干本当废品卖掉，不想再保留这半部残书了。

尽管近年因无处搁放而中止买书，但所藏卷帙仍不断增加，其来源则为友好与出版社所赠。如《王瑶文集》、《俞平伯全集》和《吴趼人全集》等，虽卷帙浩繁，而来者难拒。为长远之计，则必须把旧藏闲置之书作一番认真清理，留其可留者而去其当去者，庶几室有馀闲，可容续购矣。

以上所谈，乃两代人三处所藏书的大致情况。不料我的孙女又是一个爱书成癖者。她从小即喜买书，从儿童读物买起，不到二十年已成好买书的大学生。据她父亲诉苦，在她上海的居室中打头碰脸已无往而非书。最近她到北京来上学，除校内宿舍堆满各种书籍外，即在她临时居住的舍下那间小屋中，亦已架满笥盈，眼见要“泛滥成灾”了。看来她买书的前景将比她的祖父还可怕。盖她所买除中西新文学译著外，尚旁及哲学、社会学、宗教学、经济学乃至时装剪裁、医卜星相等。久而久之，势必浩瀚无归，靡所底止。古人说“多财信为累”，我则已深尝“多书为累”之苦；偏偏孙女竟蹈我覆辙，自寻烦恼，我亦只好听之任之。但愿从此海晏河清，藏书不再遭厄，则幸甚矣。

1998年5月在北京写讫

苹楼藏书谈片

涂宗涛

我平生喜藏书，四十多年来，藏书数量虽已逾万册（含杂志），但从未以“藏书家”自居，因藏书家着眼于收藏珍善本书，如著名的“丽宋楼”和“双鉴楼”主人，就是因藏有不同数量的宋板书而以之名楼的。我则一介寒儒，只因治学之需，才节衣缩食，连续收藏文史哲方面的基本书和常用工具书，以备阅读和翻检之用，所藏珍善本书寥寥无

几，以版本时代而言，不但没有宋刻元槧，甚至连一本明版书也没有，以其价昂，非寒素若我辈所敢问津也。若以我所藏者论价，大多贱如草芥，故以“苹楼”名其室。学人之藏书立于“用”，藏书家之藏书在于“聚珍纳奇”。举个例，我藏有一本油印刻写本《清史稿人名索引》（苏州大学图书馆 1985 年 10 月编印），一直放在手边备查，颇有用，而作为版本来说，根本说不上，藏书家对它会不屑一顾的。

我是于1943年在重庆沙坪坝上高中时才开始购藏书籍的。重庆地处西陲,又值抗战艰苦时期,沙坪坝当时虽有不少旧书店,都是普通铅印书,偶有线装书也是坊刻本,连“四部丛刊”和“四部备要”的零本线装书也很罕见。但我这时的藏书,也有值得一提者,如我于1948年带来天津的那本《四书备旨》(只有“大学”、“中庸”),书前有洪晨孚康熙戊子(四十七年)序,扉页上端横刊“乾隆四十七年新镌”,下端左脚刊“本立堂藏板”,正中刻书名大字“十二订附考备旨善本”,作为乾隆年间的坊刻本,今已很罕见了。还有一本《杜少陵评传》(朱楔著。1941年6月重庆青年书店出版),是一本用草纸印刷的书,颇有学术价值,今已很罕见,如专门收录杜诗有关版本的《杜集叙录》(周采泉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虽收了这本《评传》,却注明“未见”,可见传世者已经很少了。

我于1948年秋转入南开大学,很快迎来天津解放,随即参加了革命工作,平日既繁忙,又因是包干制无钱买书,基本上不逛书店了。从1954年起,党中央号召“向科学进军”,接着又改为薪金制,乃决心利用业馀时间钻研文史,并有计划地购书藏书。我在大学期间学过目录学,手边有本张之洞的《书目答问》,既介绍四部中的基本书,又注明版本,它就成了我购书的指南。幸运的是,天津的购书条件大大优于重庆,五十年代,天津的天祥市场旧书肆,真是琳琅满目,其中“四部丛刊”、“四部备要”、“丛书集成初编”、“古今图书集成”、“万有文库”等大型丛书的零本,随处可见,而且价廉;即使清人编刻的如“知不足斋丛书”、“海山仙馆丛书”、“粤雅堂丛书”等的零本,同样随手可得;还有解放前各地所出图书、清人板刻线装书,都能在天祥市场上陆续求得。如